



黄郁成
著



农村城市化： “礼治市场”的路径依赖



农村城市化： “礼治市场”的路径依赖

黄郁成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村城市化：“礼治市场”的路径依赖/黄郁成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

ISBN 978 - 7 - 5097 - 8747 - 2

I. ①农… II. ①黄… III. ①农村 - 城市化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9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5793 号

农村城市化：“礼治市场”的路径依赖

著 者 / 黄郁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 雁

责任编辑 / 高 雁 陈 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289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747 - 2

定 价 / 7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十年前，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旅游开发与农村社区经济”（02BJY105）时，到不少农村调查乡村旅游开发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其中在井冈山郊区土岭村的调研印象最深刻。在井冈山的旅游业兴旺之前，土岭村村民以农业为主，但种植的品种主要用来满足自身消费所需；而在井冈山旅游发展之后，随着大量旅游者的到来，村民依然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多是满足市场所需的蔬菜之类的经济作物，村民要到市场上购买粮食。农民始终是在从事自己熟悉的农业种植，但旅游者把市场带入了农村，使农民的生产目的从满足自身消费需求转变为满足市场需求，这实际上就是农村城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乡村掀起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乡村空心、乡镇空心，甚至蔓延到县城空心之时，旅游业的发达，使井冈山这样一个地处湘赣边界的偏僻小镇，依然保持着繁荣，并且不断发展。不能不说这是旅游业给偏僻乡镇带来变化，吸引到外来资本投资的缘故。以酒店业为例，由于旅游业的发展，2002 年来自井冈山市以外的投资占 64.9%^①。

当时的感觉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给农村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旅游开发将城市的市场经济引入农村；二是工业化不断吸收农村的人力资

^① 黄郁成：《乡村旅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第 216 页。

源。因此，当时将国家社科课题的研究重点放在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经济形态的影响方面，但这只是农村就地城市化的一个方面。

在完成这个课题之时，总在想那些离开农村的农民进城后命运怎样，他们是怎样进城的。这促成了我设计“礼治与市场交互作用下旅游服务职业困境研究”的想法，非常荣幸这项研究设计能够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立项支持（立项号：11YJA630037）。

在经过初步调研，并广泛阅读文献之后，我开始认为以旅游行业为研究视角似乎较为狭窄，课题设计之初所认为的工资水平受到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难以解析这个话题。必须先厘清“礼治与市场”交互作用的理论问题，而这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并且符合路径依赖的理论解释。但从经济学上分析“礼治与市场”的交互作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从管理学领域进行分析，又无法阐释“礼治与市场”的理论来源，数易其稿之后，决定在经济史的领域内，从农村城市化发展变迁的角度梳理“礼治与市场”交互作用的“路径依赖”关系，并以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主线，搭建起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框架。

本书希望能在三个方面做出贡献：一是解释中国开始现代化转型的初始状态“大一统国家与小农经济社会”的形成，同时论证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对“李约瑟之谜”做出解释）；二是揭示鸦片战争以来“礼治”秩序与市场经济交互作用对农村城市化与反城市化进程影响的线路和方式；三是提出中国经济转型的“礼治市场”假说，及其对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影响。

当然，本书只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框架，后续期待更多学者能够关注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就此进行深入研究。由于水平所限，本书必定存在诸多谬处，恳请读者能够不吝赐教。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众多前人的出色研究成果，最让我感念的是，近百年来，中外大师诸如陈寅恪、费孝通、侯外庐、瞿同祖、梁漱溟、梁方仲、全汉升、刘大钧、费正清、卜凯等学者就已经有过杰出研究，许多观点甚至让我一度感到自己的研究有点多余，但同时，他们的研究结

论也让我坚信自己的研究是行走在坚实的坦途上。本书也参考了许多其他相关学者的出色研究成果，并对他们的研究心怀感激。本书尽可能将所有引用的文献一一标注，但由于所引文献众多，可能存在疏漏之处，在此表示万分歉意，尚祈读者能够指正，并在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修正。

本书结论部分的礼治市场模型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商务信息学院统计专业学生黄乙仑设计，并由华东师范大学统计学院丁帮俊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赵红军教授修改定型。黄乙仑还翻译了所有本书涉及的英文文献，并设计了本书礼治市场路径依赖的所有框图。丁帮俊教授设计了第五章的礼治市场实证分析。

非常感谢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刘民刚教授、赵红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杨勇教授，对外经贸大学连佩珍老师各自从历史学和经济学角度所提出的卓越修改建议，本书根据他们的建议作了相应修改，但文责自负。

感谢教育部对本课题的立项，让我有机会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没有教育部的立项就没有本课题的研究，也不会有本书的出版。

感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资助了本书的出版。

感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各级领导在我出国访学、援疆以及手术期间对我本人及对我家庭的关怀。

感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的各位同事帮我完成了许多本该由我承担的工作，他们也给予我许多工作和生活上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科研处的各位同事，对项目的支持和帮助，并给予了许多的指导。

感谢南昌大学社会科学处宋三平教授对我在“旅游开发与农村城市化”项目研究的支持，这个项目是本书研究的基础之一。

感谢第八批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各位领导和“援友”在我援疆期间所提供的帮助、支持和关照。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资助了我对新疆民族地区农村城市化的调研。

感谢在喀什大学的上海援疆教师丁帮俊、谭金可、任青、马承愚、

段鸿、黄俊革、戴峰、张连毅、淦爱品在我援疆期间对我生活和工作所给予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在我手术住院，以及术后康复期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感谢喀什大学人文学院，特别是罗浩波、贾巧云、欧阳红、麦麦提依明、蔡晓明、曲满姑丽等老师在我援疆期间对我工作上的关照。援疆期间也得到了广东援疆教师刘益、黄燕的帮助。

喀什大学祖丽皮耶老师参与并组织了一项由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资助的在新疆民族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调查，使我对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区域发展空间差异有了更多的了解。

感谢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SU）屈海林博士对我在美国访学期间的指导。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高雁、陈欣老师对书稿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没有她们的倾力付出不可能有本书的顺利出版。

最后，更要感谢我的亲人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这些年来，一直在远离亲人的地方旅行、学习和工作，是我的亲人帮我撑起了整个天空，他们赡养年高老母，替我尽人子之孝，免除我的后顾之忧。我的妻子承担了几几乎所有的家务，我的儿子黄乙仑直接参与了我的研究工作，并设计了本书最关键的礼治市场模型。我的家人更在我两次手术期间，给予我体贴入微的照顾。没有家人的支持，不可能有这项研究的完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

黄郁成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概念体系	6
第三节 农村城市化的理论框架：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	22
第二章 “礼”的塑形：大一统国家与小农经济社会	32
第一节 “礼”与中国小农经济的制度变迁	32
第二节 “大一统”礼治观念与秦汉制度构建	44
第三节 中古：“大一统”的巩固与小农经济的塑形	57
第四节 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69
本章小结	78
第三章 市场的入侵：城市铸造民国	80
第一节 “市场需求”与“存天理，灭人欲”	80
第二节 广州入城与耆英之死	83
第三节 洋上海	89
第四节 天津卫	95
第五节 武汉三镇	100
第六节 城市的革命：从广州到武汉	106

第七节 上海与天津的战争	115
本章小结	123
第四章 礼治与革命：农村包围城市	126
第一节 革命轨迹：城乡之间	127
第二节 礼治价值观与新中国制度建设	140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礼治与革命的路径依赖	149
本章小结	176
第五章 礼治市场：从增量城市到存量城市	178
第一节 增量城市：在希望的田野上	179
第二节 存量城市：从礼治等级秩序到礼治市场等级秩序	201
第三节 礼治市场的实证：以城市为主体的等级市场	213
本章小结	226
第六章 礼治与城市化：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	228
第一节 城乡同构与二元经济	230
第二节 农民进城运动	236
第三节 资本下乡	253
第四节 区域城市化进程	261
本章小结	277
第七章 结论：礼治市场假说与城市化未来	279
后记 河那边	297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有文明史以来，所发生的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就是，2010年，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这表明，中国的历史在此拐了个弯，历时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发生了巨变，中国从此进入了城市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迷惘的时代。世界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汇聚进一个个如此狭小的空间。他们怎样向城市走来，将怎样改变城市，或被城市改变，是一个严肃而又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

是的，我们热爱乡村，迷恋唐诗宋词营造的田园世界。你可以想象，在上海某个冬日的清晨，你顶着夜灯，钻入地下，挤进地铁，当你沉浸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空灵寂寥的意境中时，耳边突然传来“人民广场站到了，请要下车的乘客从左边车门下车”的报站声，于是你被裹挟进也许是全世界人流量最大的地下城，再回到地面时已是高楼耸立，四季难见阳光，终年人潮涌动的南京路、西藏路，去找寻某个写字楼属于你的一方天地，面对一堆堆枯燥的数字报表，你可能会感叹这是一个没有文



化的时代。

于是，当往事不可追，我们只好再用诗人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乡村愿景来自我安慰，去勾勒城市印象的新诗境。

城乡关系、城乡矛盾和城乡冲突，以及乡村城市化、城市的未来命运，始终是今日中国挥之不去、恩怨缠绕的梦魇，哪怕全体中国人都从农村定居到城市，依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扰全体城市或农村人，所以，把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看成是一场持续长远的城乡战争一点不为过。描画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探寻化解乡村与城市矛盾的路径，归纳乡村城市化的制度轨迹，正是本书研究的目的。

本书所提到的“中国”，只是泛指从古代到现代中原政权所管辖以及参与推动中原政权演变的政治实体。

本书研究的时间段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农村城市化历史，2010年并不是农村城市化完成的节点，而是农村城市化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完成依然遥遥无期。因此，2010年并不是本书研究的下限，而是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及演变的重要阶段。

本书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经济史，可以理解为农村城市化的历史，是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向世界输出产品，以至输出资本的结果，是全球化的一部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是一个礼治价值观维系的乡土社会，传统城市是由礼治价值观打造的不同等级的治理中心，不存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现代城市。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但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维系乡土社会的礼治价值观影响，从而形成“礼治型”市场经济，而城市化的结果是在“礼治型”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形成既有传统礼治治理中心特点，也有市场经济中心功能的城市。

农村城市化是指农村“自然经济”形态向城市“市场经济”形态转换与变迁的过程，是在全社会建立工业化与市场化新体系的过程，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经济体存在两个经济体系，一个是以

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生产为代表的城市部门，另一个是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发展过程是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向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可以看成是农民进城过程。然而，根据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资本”含义不同，在传统农业的框架内，资本与生产效率已经达到最优，只有用现代资本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才能实现现代农业的转型，而这个现代资本主要就是对农村人力资源的现代化改造，这是一个资本下乡的过程。因此，城市化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农民进城，实现异地城市化；二是资本下乡，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这两个过程最终实现在城市市场经济体系上的统一。

本书的理论工具是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依据该理论，旧的经济形态在向新的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经济体系、制度框架、价值观在惯性支持下，不会立刻被新的经济形态所取代，而是会与新的经济形态发生冲突，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渡型经济形态，并经由这种过渡型经济形态，最终实现新经济形态的转型。因此，可以将这种过渡型经济形态称为“转型路径”，经由这种转型路径向新经济形态转型的过程则可以称为“路径依赖”。

在“路径依赖”理论的分析中，需确定转型前的初始状态、转型的目标形态，以及转型路径。中国开始近代化转型的初始状态为鸦片战争前夕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小农经济，转型的目标形态是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但转型的路径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这些表现都源自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市场经济对农村自然经济冲击，以及农村对城市市场经济抗拒的交互过程。

农村城市化的初始状态：鸦片战争前夕是中国转型的初始状态，在这个初始状态，源远流长的“礼治”价值观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体系下、等级森严、内向凝固的小农经济社会。中国的这种小农



经济社会不存在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表现特征的现代城市，中国的传统城市只是控制乡村的政治节点，不是现代经济意义的人群聚落。城乡社会属性相同，乡村向城市单向输出财富，城市维护乡村的礼治社会秩序。

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形态：鸦片战争强行在中国输入了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城市基因，从此，实现工业化，建立以“开放”“交易主体平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形态成为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

从初始状态向目标形态转型的路径：鸦片战争前夕，礼治价值观打造了中国“大一统”条件下内向凝固的小农经济社会，当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城市社会借助鸦片战争的强势输入中国时，传统礼法首先被迫调整，礼治价值观将市场经济体系纳入礼治秩序的评价体系之中，从西洋引入的以“市场交易主体平等”为特征的现代城市，获得了高于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的等级地位，从而形成“礼治+市场”的转型路径，可以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遵循“礼治+市场”的路径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概括为“礼治市场”特征的城市化过程。所谓“礼治市场”是指中国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市场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带有礼治原则特征的“大一统”条件约束下的等级制市场经济体系。

礼治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路径依赖，描述、解释、论述这一路径依赖发生与发展的变迁，及其本质特征正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阐述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解释本书所涉及的城市、乡村、礼治、市场经济等主要概念；概述本书应用的理论工具：“路径依赖”的理论体系及其推动制度演化的内在规律。

第二章“礼”的塑形。阐述礼治塑造“大一统”国家与小农经济社会的理论及其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初创，二是唐代大一统与小农经济的成型，三是明清大一统与小农经济的凝固。而大一统体系下，内向凝固的小农经济社会正是鸦片战

争前夕中国开始城市化转型的初始状态。

第三章市场的入侵。鸦片战争以强力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礼法关系，背靠租界、以市场经济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现代型“增量城市”获得了高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礼法地位，由此推动乡村中国以及传统城市的经济转型，这些新型城市以广州、上海、天津、武汉为代表，民国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这四座城市经济变迁与社会变革的结果。

第四章礼治与革命。阐述 20 世纪中国经历的变革，从反封建、反礼教开始，希望建立一套有利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体制，但这场变革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村，使变革的路径遵循传统的礼治价值观，将破除现代城市与市场经济高贵礼法地位视为变革的目的，从而引发了一场去城市化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套既有工业化严谨性，又有礼治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五章礼治与市场。改革开放是一场从“一大二公”的命令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的一场重启以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化变革。这场变革从人民公社解体、个体户与单位经商开始，到乡镇企业、特区和各种开发区等增量城市崛起，再到存量城市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增量城市的推动下，市场经济逐步突破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等级差异的礼治型市场经济形态。

第六章礼治与城市化。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是中国实现农村城市化的互补过程，前者是农民市民化，后者是市民下乡。但在礼治型市场经济的约束下，农民进城的方向是从礼治等级较低的农村和城市，向礼治等级较高的城市迁移，由于农村的礼治等级最低，很难实现资本下乡，从而无法完成农村就地城市化的过程。同时，礼治市场经济也导致区域城市化进程的时空差距。由于礼治市场经济存在的市场等级差异，最终使中国难以走完城市化关键的“最后一公里”。

第七章为结论。总结了“礼治市场”的模型假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线路和特点，并对未来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进行一定的评估。

第二节 概念体系

本书主要围绕“农村城市化”展开分析，研究的对象是“主体”经济形态的“演变”，这个“主体”经济形态就是“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演变则是“礼治秩序”与市场经济结合形成的路径依赖，因此有必要定义“城”、“乡”、“乡土社会”经济形态、“城市社会”经济形态、“礼治秩序”及“市场经济”体系。

一 城市

1. 中国的城市

根据《辞源》^①，“城”是指城郭，用以防护的所在，古时候王室领地，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市”指交易引申为交易的场所。《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战国策·秦一》：“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根据“城”与“市”两个字的词源意义，“城”是作为具有防护设施的统治中心而出现的，“市”则是因乡野地区货品交易的需要所形成的。“城市”两字合在一起的说法，根据《辞源》，源自《韩非子·爱臣》的“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意思是说，大臣的财富再多，也不可借助城市形成威势。

根据《辞源》的解释，“城”与“市”合在一起形成的“城市”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政治”与“财富”中心。韩非已经看到了城市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以及由此对王权所构成的巨大威胁。

中国的“城”“乡”之分，可追溯至西周时期“都鄙”的分野，或者说“国野”之分。

侯外庐认为，（西周）封国就是筑城。“邑”是国家的经济形态，是国家发生的基础，那些周室所赐的“邑”，或周室小宗长的“邑”，

^①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第603、967页。

指的是联盟部落的小国，也就是“封”国的意思。到了春秋时代，由殖民开启的诸侯的封国^①。

根据侯外庐的研究，可以做如下归纳：最早的城市称为“国”“邑”，是强势氏族征服其他氏族之后所建的以宗庙等礼制建筑为中心的，具有军事防护功能的聚居区。封“国”，宗“邑”均为建国筑城。城市只是统治散落于广大乡野被征服氏族的城邦。居住在城里的是具有统治地位的氏族，而居住在乡野的则是被统治、被征服的氏族。

因此，最早的城市有以下特征：①具有防御等军事功能的聚居区；②以宗庙祭祀为中心的氏族共同体；③接受乡野被征服氏族的经济供养；④具有政治上的特权。

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作为统治中心接受乡村的供养，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属性相同。

根据邵鸿的研究，中国的市场，主要是位于乡间的“乡村市场”和“小城邑市场”，这些属于“日中而市”，以满足乡村居民日常生活和生产所需的交易为主。县级以上的城市市场是在经历从春秋时代至战国时代大规模的兼并，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之后形成的。在一国之内形成了众多的以郡县“治所”为核心的城市市场，应有700~800个这类城市市场。这些城市大多有独立的工商业体系，除满足城市自身需要之外，还能满足周边乡野商品交换的需要，而类似于“陶”这样的城市，因其商业的发展，甚至成为“天下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城市的经济能量巨大，邵鸿引述了《史记·冯唐列传》“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餐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李牧所部有15万人之众，市租能满足如此庞大的军费之需，可见其市场能量的巨大。^②

此外，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城市，在各诸侯国的庇护下还能拥有发达的工商业，强势的商人甚至可以左右一个诸侯国的政治，秦始皇本人就

①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70、176、179、197页。

② 邵鸿：《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125~136页。

是在巨商吕不韦的商业操作下得以掌握秦国国政的。正如邵鸿所论证的，战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强化，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与专制王权存在着根本的矛盾”^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城市就完全成为政治中心。城市居民主要是由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官员或寄居于此的缙绅地主，以及为这些阶层服务的市民组成的。中国的城市很少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必须依靠乡村的供养。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存在，城市的经济就能得以发展，一旦政治中心转移，城市经济则趋于衰退，甚至荒废。施坚雅以开封为例，论述了其作为政治中心时期的繁荣，以及政治中心转移后的衰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②

正是出于对“亨利·皮雷纳－马克斯·韦伯”的“城市共同体”理论的不认同，罗威廉分析了汉口的商业社会。他指出“19世纪的汉口社会与现代早期西方城市拥有相似的显著特征”。他从“商业变化、个人身份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组织变化”四个方面论证了汉口城市特征的兴起。特别是伴随着财政依赖的日益增加，政府对商业的控制却戏剧性地松弛下来。中国经济中的诸多领域不断走向‘私域化’。事实上，在汉口商业领域，商人自治全面取代了官府的直接控制。^③

但是，罗威廉研究的是1796～1895年这100年汉口的发展，而在此时清朝后期政府乃至湖北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巨大的财务亏空，不得不放松对城市的商业管制，以获得稳定的商业财源。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口和社区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罗威廉的另一本书《汉口：一个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又特别指出“汉口的部分城市精英

① 邵鸿：《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第310、315页。

② 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第1～3页。

③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76～77页。